

#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理论根源与对策思路

□ 谢安世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 / 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4)

[摘要] 对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成因,学界提出了若干因素,但没有进一步解释这些因素产生的原因和机制。文章指出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不只是表面上的经济地理问题,实际上是政府官员的发展观念与行为模式问题,上升一步说是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和综合效益问题,更为根本的是区域性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问题。因为符合感性逻辑,在认识和分析区域发展问题时,人们容易习惯性地滑入比较优势的范畴,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文章指出李嘉图及其拥趸者,将亚当斯密所指的经济活动全流程的组织效率,替换成了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才导致了人们的误解误用。文章在剖析李嘉图和斯密两大流派的内涵及其异同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基础上的集聚优势导向的区域发展战略。

[关键词] 区域差距 比较优势 集聚优势 发展战略 发展模式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3.025

[中图分类号] C91;C93;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7)03-0141-08

一般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大体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三个阶段(高萍,2006)<sup>[1]</sup>。区域发展差距一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院士(2003)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矿产资源、水资源、交通等传统因素的作用就逐渐下降,经济国际化、信息、科技、生态环境、体制创新等都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在明显改变着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sup>[2]</sup>。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逐步确立,但是工业化水平的地区性和地带性差异逐渐明显,中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也逐渐扩大,因此区域发展问题愈来愈成为各级政府规划决策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

## 1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研究,主要有现状

与成因、测试指标体系、发展趋势分析、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等研究视角,概况如下表所示:

表 1: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相关主题文献概述

研究视角	代表性文献作者
现状与成因	区位选择:孙兵(2010)孙煜泽(2012);产业结构:覃成林等(2011)干春晖等(2011);经济人口空间分布:樊杰等(2010);全要素生产率:杨万平(2014);要素流动:胡星(2007);官员政治激励:张军 & 高远(2007),徐现祥等(2011);制度绩效:罗雪(2006);政策倾向:盛松成 & 石春华(2015)
测度指标体系	隋妍 & 朱孔来(2000),朱孔来(2004),曾小平(2010),徐勇 & 樊杰(2014)
发展趋势分析	饶会林(2005),金相郁 & 郝寿义(2006),盛松成 & 石春华(2015);
数理模型与实证	金相郁(2005),保建云(2008),陈东 & 樊杰(2011),曾冰(2015);

对于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现状与成因分析方面,有多种解释。有区位选择说:基于区位中心扩散理论,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7324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4BJY084);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规划重点项目(2013GH002);浙江省青年社科学者创新团队“区域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研究”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谢安世(1983-),男,湖北鄂州人,管理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工业大学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技术创新与企业国际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孙兵(2010)<sup>[3]</sup>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接近中心的地区经济活动更为密集,而且由于聚集经济使得工人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更高。中国的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这一区位优势使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经济资源,而西部的周边地区经济不发达,难以吸引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了二者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孙煜泽(2012)<sup>[4]</sup>也认为经济活动地理集中存在中心——外围空间结构,要素集聚与资本技术扩散是经济活动地理集中的关键,内在机制包括地方化集聚发展、产业组织共生发展和空间结构优化发展。有产业结构说:覃成林等(2011)<sup>[5]</sup>研究认为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原因是区域间的产业发展差异大于其各自内部的产业发展差异。干春晖等(2011)<sup>[6]</sup>在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上,构建了关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模型,探讨了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经济人口空间分布说:樊杰等(2010)<sup>[7]</sup>研究表明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分布态势,与区域差距的形成有密切关联。有全要素生产率说:杨万平(2014)<sup>[8]</sup>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研究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发现在西部大开发以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现逐年上升的良好趋势。有制度决定说:罗雪(2006)<sup>[9]</sup>将中国正在进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看作一种“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通过考察东西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与正式制度安排的不同兼容性和不同的制度运行效率,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区域发展差距日益增大。有官员政治激励说:张军和高远(2007)<sup>[10]</sup>利用1978年至2004年间在各省任职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详细信息以及省级经济增长的数据库,考察了对省级高级官员的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对地方经济业绩的影响。徐现祥等(2011)<sup>[11]</sup>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开始把发展经济当作首要目标,通过财政和人事干部体制改革,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等方面把地方官员的职业发展、辖区财政收入与其辖区发展捆绑在一起。地方官员对激励作出反应,既致力于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致力于辖区发展,也主动或被动参与辖区间的标尺竞争,致力于取得比其他辖区更好的经济发展绩效,以期在竞争中胜出。地方官员这种既致力于发展辖区经济又致力于拉开辖区间差距的行为,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内发展迅速、区域间矛盾突出。有要素流动说:胡星(2007)<sup>[12]</sup>认为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发散理论对于中国地区发展差距的现状和趋势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缪尔达尔等人的非均衡增长理论以及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解释在我国得到证实,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地区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几乎具有同步变化的趋势,政府目前推行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和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十分必要,劳动力和资本向东南沿海地区的流动使东部地区的二元产业结构得以维系,这会在一程度阻碍产业的梯度转移,不利于缩小东中西部差距。

对于中国区域差距的测度指标体系,隋妍和朱孔来(2000)<sup>[13]</sup>较系统地从事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市化水平五个方面提出了多层次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测算;朱孔来(2004)<sup>[14]</sup>提出一套区域差距衡量指标体系及定量化测算方法,并对山东省东西部地区之间各方面的差距进行了定量计算和全方位的分析比较;曾小平(2010)<sup>[15]</sup>从绝对差异指标和相对差异指标两个方面定量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徐勇和樊杰(2014)<sup>[16]</sup>则在进行区域发展差距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类型划分,以及阐述构建区域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遵循的基本原则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发展差距构成要素进行甄别、归类和属性特征分析,筛选、构建和设计出了以衡量民生质量为导向的、包含由3个综合指标、18个要素指标和54个属性指标构成的宏观测度指标体系和由3个综合指标、14个要素指标和70个属性指标构成的微观测度指标体系。

在中国区域差距的发展趋势方面,饶会林(2005)<sup>[17]</sup>认为J·G·Williamson关于区域发展差距走势的倒U字型观点是正确的,通过引入双S曲线的理论,完善其理论与方法;金相郁和郝寿义(2006)<sup>[18]</sup>利用CV、HHCI、TEC、MLD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趋势,包括省际发展差距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发现1990—2003年期间省际发展差距和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而2004年出现下降趋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盛松成和石春华(2015)<sup>[19]</sup>指出从国内生产总值看,东部地区GDP规模占了全国一半多,随着经济发展,东部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日益上升,东北地区占比下滑明显,中、西部地区占比变化不大。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第一、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快速上升;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化近似,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人均GDP

看,东部和东北地区超过全国水平,中、西部地区人均GDP 低于全国水平。

在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理论建模与实证分析方面,金相郁(2005)<sup>[20]</sup>实证分析认为在 1952-2000 年期间,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符合“Amos 假说”的格式。但是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特征,在 1952-1980 年期间,其差距符合“Williamson 假说”的格式,并在 1980-2000 年期间,其差距符合“Amos 假说”的格式。保建云(2008)<sup>[21]</sup>以 Hoover 地方化系数和 Krugman 指数为基础构建了新的地方保护度指标,从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大经济转型角度构建了一个解释区域差距、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一体化发展之间相关关系的理论框架,探讨了区域差距扩大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效应。研究指出,为了实现追赶目标、最大化地方就业与财税利益、充分显示官员政绩,地方政府有进行地方保护的积极性,区域发展差距越大,欠发达地区进行地方保护的积极性越高。曾冰(2015)<sup>[22]</sup>选取区域金融为视角,对省际金融发展差距与经济发展差距之间关系加以理论分析,同时基于 VAR 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相互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省际经济增长差距带来了省际金融规模上的差距变化,导致了省际金融效率上低水平的平衡性发展,而省际金融效率上的差距并未对经济差距和金融规模差距造成影响,省际金融规模上的差距只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省际金融效率上的差距,而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差距。陈东和樊杰(2011)<sup>[23]</sup>通过构建计量方法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阶段(1978-2003)银行间信贷资本的区际流动方向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成因。计量结果发现,存在区际间信贷资本流动的年份,资本并未从发展条件较差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发展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而呈现相反的流动。这表明银行间信贷资本的区际流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区域发展差距,政府对信贷的管制以及市场环境的变化分别导致了 1994 年以前以及 1994 年以后的银行间信贷资本流动。

如上文献所示,许多学者从各方面因素对于区域发展作了多角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另外还有很多学者从生产效率、生产成本、要素禀赋、竞争态势等不同视角对区域发展问题进行了诠释,并提出了发展和赶超视角下,认识和利用各种比较优势,以促进区域发展的不同主张。可以看到,在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时,研究者自觉地认识到了上述因素,不自觉地阐述各区域在这些因素方面不同的比较优势,并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建议;而决策者不自觉地认同各区域存在不同的比较优势,自觉地运用相应政策去进行人工干预,企图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笔者充分地相信研究者和决策者,对于协调中国区域发展,改善地区和人民福利的善意,然而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概念的解读过于简单,运用甚或错误。

## 2 比较优势及其在区域发展中的误解误用

区域发展差距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非常广泛,涉及到自然、经济、社会 and 能力的多个层面,影响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因素,种类繁多,许多文献已多有讨论,这里不再一一列出,但概括起来,主要有地理区位、基础设施、体制机制、方针政策和市场形态等方面,影响区域发展格局的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如下图 1 所示。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形成、变化和趋势,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因素的产生和变化呢?即中国区域发展差距形成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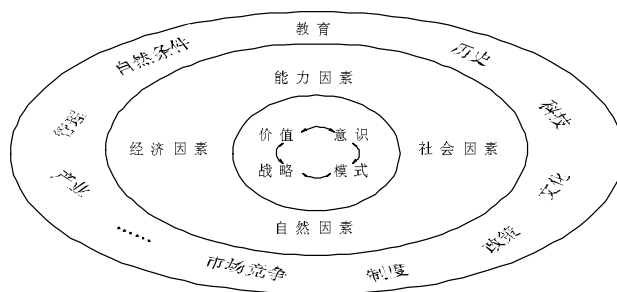


图 1: 区域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完善,政府成为塑造区域发展格局的主导力量,因此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不仅是表面上的经济地理问题,实际上是政府官员的发展观念与行为模式问题,上升一步说是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和综合效益问题,更为根本的是区域性的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问题。

因为符合感性逻辑,在认识和分析区域发展问题时,人们容易习惯性地滑入比较优势的范畴,形成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然而对于比较优势的理解,各学派间却有着显著的不同。细读经济史,不难发现,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两大传统,其一是源自亚当斯密,其二是源自大卫李嘉图。

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对一国所有商品的生产效率都低于另一国时,这两国仍会相互贸易的事实无法解释,因此李嘉图提出一国可以专门生产并出口

其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商品,也即有相对优势的商品,同时进口其绝对劣势相对较大的商品。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学说,因为看得见摸得着,从感官上容易体认,因此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但在斯密看来,专业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因此经济学之于斯密,最为核心的,是经济活动全流程的组织管理效率,而李嘉图及其拥趸者,将这一核心,替换成了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承自斯密而另有创见的杨小凯的分工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诺斯的产权理论,以及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可视为一个彼此呼应的,强调内生性比较优势的,与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传统。斯密和杨小凯强调专业分工对于生产和贸易的重大作用,熊彼特强调以创新为基础的专业分工,诺斯则强调创新需要制度支撑,迈克尔波特则把创新所需的制度支撑进一步具体操作化。由此可知,除李嘉图一脉外,尚有另一脉继承并发扬了亚当斯密的本原意旨。因此,可以将源自大卫李嘉图的、主流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称为外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片断性特征和局部性特征;而将源自亚当斯密一脉的比较优势理论,称为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经济活动全流程的组织管理效率,具有全局性特征和全过程性特征。

如上文分析所言,因为看得见摸得着,从感官上容易体认,人们对比较优势的认知,容易习惯性地滑入李嘉图的外生性比较优势的范畴,并因此形成所谓主流经济学观点。当前主流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世界各国经济政策影响巨大,但无论是大卫李嘉图的外生性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亚当斯密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从国家和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则应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皆不可盲从。

第一,从“比较优势”的概念来看,它是一个来自国际贸易领域的经济学概念,不应该生搬硬套进国家和区域发展的话语体系中来。不必讳言,区域发展,其首要目标是区域经济发展,但也不仅限于经济发展,区域内社会、民生和人居环境同样重要。即使区域经济发展,比较优势也不宜成为其发展战略的导向性原则。从“比较优势”这一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来看,按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生产和贸易,是由当时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已经发达的英国提出来的。英国可以从其他落后的农业国,进口低附加值的原材料和初级制成品,而向这些国家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长此以往,英国与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必然发展成为市场空间的二元体系

结构,这对于当时欧洲其他尚未工业化的、落后的农业国来说,显然非常不利。应该说,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着的、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二元结构,与政府官员受比较优势影响的发展理念、基于比较优势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从“比较优势”的内涵来看,虽然李嘉图强调资源配置效率,而亚当斯密强调组织管理效率,但两者都是造成当前中国区域发展二元体系结构的根本原因。如何见得?首先,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强调资源配置效率,因其片断性和局部性的缺陷,导致社会生产要素在区域间流动上的分化。什么赚钱就干什么,这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本义,东部地区市场交易活跃,其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必然会诱导中西部人财物等生产要素流入,而且流入要素的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好。其次,亚当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强调组织管理效率,本质上是强调分工的效率,也因人们对其误解误用,忽视其全局性和全流程性的本质特性,导致了产业结构在东中西部区域布局上的分化。东部地区市场体系完备,工业发展对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大量需求,必然刺激中西部地区进一步扩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中西部地区一直处于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附属地位;西部大开发十几年来,产业垂直分工布局不但没有改变产业,反而得到了强化。

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其本身存在着一种不断恶化其自身环境的内在机制。比较优势导向的发展模式下形成的这种区域间的二元体系结构及其发展,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必然在“马太效应”的驱使下,将进一步强化乃至畸形化,最终一方面危害到国家整体布局发展,另一方面也将危害到这种二元体系结构本身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发展几十年来,一方面东部地区愈加发达,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东西两极内部也出现问题,如东北重工业基地发展迟缓,中西部煤矿资源区也发展乏力。一方面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价格竞争,必然需要尽量降低人工成本,严格控制工资水平,从而出现用工荒。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者的收入,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加剧了国内的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国内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等造成巨大压力,在一些关键性产业,如先进制造业和大飞机产业等领域,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严重不足的,甚至呈现出下滑趋势。

### 3 比较优势的深化与区域发展中的集聚优势战略

当前,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两难选择:既要保持东部地区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势头,也要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既要稳步地推进中西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也要积极地推进中东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既要通过加快科技进步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也要保持和进一步扩大全社会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既要注重缩小差距以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与公正,也要注重提高效率以保持全产业范围内的生机与活力;既要保持和推进各个领域内的市场竞争机制,同时也要关心各阶层民众在生产与生活各方面的困难问题。时至今日,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高度互动,且更加复杂多变,一面发展,一面转型,矛盾迭出,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管理方式构成了新的挑战,对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有了更高的要求。

虽然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较好地解决了比较优势产生的动力源泉问题,却依然无法解释“里昂惕夫之谜”,也即“比较优势陷阱”的问题<sup>[24]</sup>。事实上,无论是大卫李嘉图的外生性比较优势理论,还是亚当斯密的内生性比较优势理论,两者都着重于创造和培植自身优势,而对于开放式经济环境下,如何认识各方优势,并为我所用这一问题,却没有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

全球化进程日渐深入,全球性竞争也日趋激烈。比较优势理论自诞生以来,尽管经历了多阶段多层次的发展,但其核心思想并没发生实质性变化,即始终是关注和强调自身的优势,打造和利用自身的优势,对于他方优势关注不多。现实的全球竞争中,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只是取决于其自身优势,更多地是取决于认识和利用他方优势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来讲,由于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不同,尽管每个经济体都具备不同的特点和优势,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谁自身拥有较多的静态初始优势,而是谁能够超越自身优势,动态地利用他方优势。具体来讲,就是,如果某个经济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对他方优势进行动态地挖掘、发现、吸收和利用,并不断地积累、内化和再创新,则这个经济体必然将获得无可比拟的竞争优势。因此,与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不同,优势集聚理论认为资本积累、要素禀赋、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劳力分工、产业结构、体制机制、管理技术、文化习俗等等因素,是优势集聚的对象与方式,优势集聚导向的生产方式,才是

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那么,优势是指什么?集聚是指什么?如何进行集聚?优势集聚的表现是什么?有什么方式、方法与策略?和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在竞争环境下,各方都进行优势集聚,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说到优势,就不能不提“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原本是古典贸易理论中的一个专有名词,由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贸易理论”演化而来。原本意涵是指绝对优势或绝对劣势中的比较优势,意指自己多个物品之间的比较。比如计算机芯片技术与火箭发动机技术,中国都比美国要差一些,与美国相比,中国都处于绝对劣势。但是与计算机芯片技术相比,中国的火箭发动机技术更强一些,因此在与美国的贸易中,中国在火箭发动机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一词,从国际贸易这一领域,扩展到其他人文社科领域之后,尤其是演变成日常用语之后,其含义就类似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以及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意指自己与他人同一件事物上的比较。

优势集聚,这里的“优势”,不同于李嘉图所指的、相对于自己另一物件的较低的成本,也不同于亚当·斯密所指的相对他人的高效率或低成本,也不完全等同于迈克尔·波特的所指的在特定产业(或环节)方面压倒对方的有利形势。集聚优势,就其本义来讲,这里的“优势”泛指一切有利于目标达成的较为优异的因素。就经济发展问题而言,“优势”是指一切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这一目标的较为优异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在开放式条件下,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这一目标,必然要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竞争,必然要遵循“经济发展=经济因素+非经济因素”这一公式所揭示的内在规律。一般来说,经济因素又可以分狭义经济因素与广义经济因素两类。狭义经济因素,包括机器设备等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要素。广义经济因素,则包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制度、品牌、习俗、区位、创新等间接参与生产活动的要素。非经济因素,非常广泛,这里主要指对于前述各类经济因素的运用能力,如认知能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教育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等。

优势集聚,这里的“集聚”,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集合,二是积聚。优势集聚,意指对上述“优势”进行挖掘、发现、吸收、运用、积累、内化和再创新。具体来讲,优势的“集合”,意指经济体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

除了对自身情况的掌握之外,首要任务便是对其他先发经济体,进行调查和研究,摸清状况,对他方优势进行发现和挖掘,进而吸收和利用。通过优势的“集合”,以获得优势的可利用权,实现他方优势“为我所用”。由于集合来的优势,有着短暂性与外部性,在初期往往易于离散,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而言,还应该实现对外部优势进行持续性积累与内化,以便使得自身对于集聚而来的外部优势,具有强劲的内部支配力,从而避免出现优势离散的情形。同时,经济体不能仅局限于利用优势,还需要不断集成与创新,实现优势再造。因此,优势的“积聚”,意指经济体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除了进行优势集合之外,还要对集合来的各类优势,在长期方向上,进行积累、内化和再创新,以获得优势的创造权,实现综合优势“为我所有”。

优势集聚导向之经济发展战略,是指经济体基于对未来趋势和机遇的判断,突破自身静态比较优势的局限,集聚全球各方优势,以实现经济生产、社会生活、生态保护等全方位综合效益最优化为目标的发展战略。相应地,优势集聚导向的发展模式,就是遵循这种战略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据前文所述,优势集聚,意味着对各类“优势”进行挖掘、发现、吸收、运用、积累、内化和再创新。因此,优势集聚导向的经济发展,就意味着一个经济体在技术、产业、以及其他软硬件设施方面,其转型与升级的路径与方向,背后含藏着这样一条轨迹:挖掘发现、模仿学习、吸收转移、渗透融合、自主创新。

上述优势集聚的观点主张,与内生动态比较优势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吻合的。比如两者都认为自身的竞争优势是动态的,是可创造的,但这里提出的优势集聚,主要是从“集聚”他方“优势”,形成自身竞争优势,这一视角提出的。对于静态外生比较优势,优势集聚理论虽然强调应当突破自身要素禀赋的约束,但绝不是完全否定其作用,恰恰相反,高端地利用自身禀赋条件,正是进行优势集聚的重要手段。

所谓跳出自身静态比较优势的局限,意指不要简单地、过度地发挥外生比较优势。事实上,经济体自身的禀赋条件和比较优势,是进行优势集聚的重要基础。如果运用得当,能够为优势集聚进程提供重要支持。如果运用不得当,反而成为优势集聚的障碍。如果在战略、制度和政策的设计和执上,缺乏优势集聚导向性,便很可能出现“资源诅咒”现象,爆发“荷兰病”,从而掉入“比较优势陷阱”。例如,在中国部分区域,通过

简单挖掘自然资源,实现了经济发展,但多数矿场技术水平低、环保力度弱,不仅长期危害当地生态环境,并在短期内就对工人身体健康产生极大伤害,极端情况下甚至爆发矿难,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不幸,进而引发各类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所谓高端地利用自身禀赋条件,是指对于有限的禀赋条件和优势,经济体应当着眼于高端深度地利用,使其成为提升优势集聚的内在能力的重要依托,而不应当简单和过度开发利用。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经济体要从促进优势集聚的角度,而非简单获取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资源禀赋优势的利用方式进行重新认识和系统设计。例如,曾经长期依靠砍伐森林资源,获取经济收入的中国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自从砍伐天然林被严加禁止之后,改变发展思路,依托固有风险,建设国家森林公园,大力发展观光旅游产业,实现了从“砍伐经济”向“旅游经济”的转变。可见,对于同样的禀赋条件,基于不同的出发点和利用思路,会产生大为迥异的效果。

如何进行集聚?优势集聚有什么表现?有什么方式、方法与策略?经济体进行优势集聚,其具体方式方法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根据对象的不同,可分为专项优势集聚和组合优势集聚。所谓专项优势集聚,主要针对某一项特定的要素或能力优势,进行集聚;组合优势集聚,是指针对多项优势组合同时集聚。例如在引入优质FDI时,往往同时集聚了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根据发生区位的不同,可分为内向型集聚和外向型集聚。所谓内向型集聚,指通过将外部优势引入本地发挥作用,并在本地实现积累、内化和再创新;外向型集聚,则是指“走出去”,在其他经济体中实现优势集聚。根据发起主体的不同,可分为主动性集聚和自发性集聚。所谓主动性集聚,是指经济体主动寻找合作伙伴,以开启集聚优势的进程;自发性集聚,是指经济体由于具备较为有利的初始条件,从而自发地吸引其他经济体,主动前来寻求与之开展合作。根据所有权的转换情况,可分为产权转移型集聚和产权非转移型集聚。对于前者,经济体在集聚优势的同时,直接发生了要素或能力产权的转换。对于后者,经济体虽然获得了外部优势的实质可利用性,但并没有直接实现产权的转移。例如,在大量外商投资企业中,虽然东道国实际利用了国外先进技术,但技术所有权仍在外资方手中。

优势集聚对经济增长有什么实质性作用?就经济

增长来讲,集聚优势的观点认为自然资源、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劳力分工、乃至制度、管理和文化等因素,是集聚优势的对象与方式。优势集聚导向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因此任何经济体,想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赶超,非常有必要注意和跨越我们常讲的“比较优势陷阱”,走优势集聚导向的发展道路。在开放式经济条件下,落后经济体只有制定与实施优势集聚导向之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优势集聚导向之经济发展模式,才有可能避免简单依赖比较优势的诸多不利条件,出现跨越式增长,加速缩短与先发经济体的差距,并基于较高的长期增长率,从而实现经济总量和人均资本的赶超。

在开放式竞争环境下,各方都在进行优势集聚,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不同的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了完成差异化的发展目标,需要集聚的优势也是不同的,不同条件下,集聚的方式与途径也是不同的。因此,优势集聚的过程,是一个基于不同情境,不断调整和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一个经济体若进行优势集聚,其内部各区域之间,以及与其他经济体之间,将会充分地互动、竞争与合作。同样地,一个经济体在集聚他方优势的同时,自然也会向对方输出优势,往往与他方经济体形成双向或多向集聚关系,参与者都将获得经济福利效应的提升,最终形成一种多赢格局。

#### 4 缩小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对策建议

经过大量调查访谈研究,发现中西部地区相当比例的官员,受传统比较优势思想影响较深,且大都偏向于简单理解和运用。在不少官员的理解中,“发挥比较优势”主要是指对本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对现有优势产业的继续发展。从推动优势集聚导向行为的政策力度看,东中西部地区呈现逐次递减态势,如果这一局势得不到扭转,区域差距很可能进一步扩大。为此,我们有如下建议:

首先在宏观上以国家系统力量,集聚国内外各领域精英专家学者,进行顶层设计,协同制定集聚优势导向的发展战略,并以国家力量予以实施。比如在区域发展目标上,改变一段时期以来的狂热躁动和好大喜功的高速偏好,理性务实地看待经济增长速度,以区域内物质财富增长与否,人民得到实惠与否,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与否,作为区域发展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在区域发展的先行战略上,应当具备开阔的视野,破除简单发挥比较优势的思想束缚和路径依赖,以集聚战略目标

优势为前导,驱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人才、资源、政策、管理和技术等各方面优势的集聚,增强区域内和区域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政策的协调能力,加快发展和赶超。

其次要围绕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将短期政策与长期制度建设相结合,形成优势集聚导向的发展模式。比如在中西部地区设立若干城市特区,利用两到三个“五年规划”,将首都从北京迁往中部或西部区域某一特区,以促进东中西部区域的均衡发展。对现存的全国省级行政区进行重新划分,并重新确定各行政省区的省会城市,以促进省级行政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在中央和省级行政区之间增加一级行政区划,恢复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大区制度,增加区域发展的协调力,以促进省级行政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又比如,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性保障。在城镇化进程中,着力推进户籍社保等系列改革,促进城乡及城市内部二元结构问题的解决,建立起城乡、城城、乡乡,多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释放市场活力,建立起政府与市场间长期的协同制度。促进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提供持续不竭的动力。

最后要集聚政策优势,鼓励集聚优势导向的发展行为。在加速东部自贸区建设同时,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促进东中西协调发展的长期性动力,促进东中西部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提供持续不竭的动力。比如可以制定强制性政策,将北上广深等一线特大城市中的部分大型教育、医疗机构,搬迁至中西部区域,或者要求这些大型教育和医疗机构在中西部地区设立分支派出机构,制定鼓励性政策,保障机构内人才专家在区域间的流动;原各省会城市的大型教育、医疗机构,可依此规则适度进行分散和分流。通过鼓励科技研发和自主创新政策,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脱虚入实”,从根本上增强国家创新能力。通过相关治污环保政策,促进绿色生态低碳型产业发展。通过放开中小民营银行等金融政策,为中小企业融资拓宽路径。

参考文献:

- [1]高萍.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次转向[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01):9-12,142.
- [2]陆大道.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J].

- 地理研究,2003(03):261-271.
- [3]孙兵.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01):1-4,9.
- [4]孙煜泽.中国区域和谐发展的新特征:基于地理集中视角的分析[A].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ICASS 2012) Volume 3 [C].Information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USA:,2012:9.
- [5]覃成林,张华,张技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趋势及成因:基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的测度及其空间和产业二重分解[J].中国工业经济,2011(10):37-45.
- [6]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4-16.
- [7]樊杰,陶岸君,吕晨.中国经济与人口重心的耦合态势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地理科学进展,2010(01):87-95.
- [8]杨万平.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源泉:基于人力资本与能源消费的双重约束[J].华东经济管理,2014(1):30-35.
- [9]罗雪.正式制度实施绩效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21-24.
- [10]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11):91-103.
- [11]徐现祥,王贤彬,高元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J].世界经济文汇,2011(03):26-58.
- [12]胡星.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理论和现实思考[J].广西社会科学,2007(04):57-60.
- [13]隋妍,朱孔来.区域经济差距衡量指标体系及量化测算方法[J].统计研究,2000(10):52-56.
- [14]朱孔来.区域经济差距衡量指标体系及量化测算方法的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4(09):32-41.
- [15]曾小平.基于地区差距指标体系的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J].开封大学学报,2010(02):5-9,23.
- [16]徐勇,樊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测度指标体系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2014(09):1159-1166.
- [17]饶会林,陈福军,董藩.双S曲线模型:对倒U型理论的发展与完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123-129.
- [18]金相郁,郝寿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趋势分析[J].财经科学,2006(07):110-117.
- [19]盛松成,石春华.区域经济差距趋势分析[J].中国金融,2015(17):24-27.
- [20]金相郁.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格式实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5(01):1-5.
- [21]保健云.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一体化发展: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转型大国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8(08):106-112.
- [22]曾冰.我国省际金融发展差距与经济差距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5(04):74-82.
- [23]陈东,樊杰.区际资本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对中国银行间信贷资本流动的分析[J].地理学报,2011(06):723-731.
- [24]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J].经济研究,1997(06):20-26.

责任编辑 许巍